

世界体系与台湾发展

牛可

【内容提要】 世界体系理论对考察和评判后起发展进程中的外部结构因素提供了有价值的整体视角和诸多理论性启发,但并不能圆满处理发展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基本问题,即外部因素与内部因素、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的作用及相互关系问题。证之以战后台湾发展的历史经验,其未赋予地缘政治因素以及核心国家政权以应有理论地位的缺陷更形突出。参照世界体系理论的一些提示并针对其不足,本文强调战后台湾发展的外部条件中的关键因素是美国国家政权的 地缘政治行为,而不是核心资本积累的经济逻辑;进而提出扩展“三边联盟”的主张,即在发展研究中必须全面考察核心的国家政权和跨国资本、边缘的政权力量和当地资本这四个依附关系结构中的基本要素和行为主体。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揭示台湾发展的外部动力机制和历史特殊性。

世界体系理论脱胎于新马克思主义的依附理论,但是它的中心论题和理论目标已经超越了依附论,不再集中关注边缘国家发展的结构性障碍即“欠发达”问题,而是在设立“整体主义”(holism)的理论视阈和方法论的基础上,从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组成部分之间的交互运动性质出发,探究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全球性社会历史现象的结构

和过程。^①

在这种整体主义视阈下,沃勒斯坦及其追随者反对社会科学研究中通行的和不言而喻的做法,即把民族国家或国民社会作为分析单位,而是认为:社会科学惟一正当和有意义的分析单位是内部具有单一、完整、广泛、自足的社会分工的历史体系(historical system)。他们断定,在19世纪以后世界上只有一个这样的历史体系即资本主义世界体系(world-system)。在这个世界体系中根本无所谓“民族国家的发展”(national development),有的只是世界体系作为整体的发展。^②世界体系理论的上述及其他诸多理论命题与如下的哲学和认识论立场相互支持相互加强:世界体系内次级体系(subsystem)中发生的任何事情都必须从整个体系范围内的结构和矛盾运动去说明,次级体系中发生的事首先取决于整个体系中发生的事,对次级体系而言的外部力量是次级体系中所发生的事情的决定性力量;世界体系设定了次级体系内部的力量和这些力量相互联系的方式。世界体系理论一般不否认内部力量也有某种自主性,但是在内外因素的关系中,是外部联系决定内部发展。^③

作为全面考察资本主义的宏大社会历史理论体系,世界体系理论与古典的马克思主义一样,将分析的出发点和关注的重点置于经济领域。但是与马克思不同,为了能够同时解释世界体系的总体趋

① Robert L. Bach, "On the Holism of a World - System Perspective", Terence K. Hopkins & Immanuel Wallerstein (eds.), *Processes of the World - System*, Beverly Hills: Sage, 1980, p.308.

② 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460—462页;Wallerstein, *The Politics of World-Economy: the States, the Movements and the Civilizations*, London: Cambridge Univ. Press, 1984, pp.1-2; Wallerstein, "The Rise and Future Demise of the World Capitalist System: Concepts for Comparative Analysi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1974, 16(4), pp.390-391.

③ Vincente Navarro, "The Limits of World-System Theory", Christopher K. Chase-Dunn (ed.), *Socialist States in the World-System*, Beverly Hills: Sage, 1982, pp.85-86.

势和各组成部分的变化,沃勒斯坦不是从生产者及其剥削者在生产领域里的关系这样一种抽象的、微观的角度出发,而是在全球性的交换和流通领域这样一个空间的、宏观的范围内去揭示现代资本主义。这种理论路径直接导致世界体系理论接受依附理论提出的“中心—边缘”结构模式。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世界体系的基本关系结构不是纯粹的资本主义条件下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组成的两极、平行的关系结构,而是处于全球“商品链”和分工体系当中的不同位置的国家 and 地区——“核心”、“边缘”和“半边缘”所构成的层级结构。^①

世界体系理论并不能够被视为通常意义上的“发展理论”,它的著述有时被列入新起的所谓“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的学科文献目录之中。^②但是研究“民族国家发展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 of national development)的人无论赞成还是反对都必然要面对它,因为这种整体主义的理论以极为直接、全面、深入和独特的方式进入了对欠发达国家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两个最基本的问题:第一,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关系问题;第二,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的关系问题。

二

发展进程中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关系问题可以更具体地表述为与外部资本主义的国际联系对落后国家(地区)的发展的作用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向来有两种基本的认识倾向,一种是对这种作用的历史意义作出正面的积极评价,另一种倾向则是对这种作用持反

① 华勒斯坦:《历史资本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3—23页;Wallerstein, "The Rise and Future Demise of the World Capitalist System".

② 切斯—顿就把世界体系理论的许多重要著作列入其主编的文献丛书(*The Libra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第9集中。Chase—Dunn(ed.),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Brookfield: Edward Elgar, 1995.

面的否定和批判态度。马克思、卢森堡和比尔·沃伦分别在三个连续的激进主义思想史阶段里典型地代表了前一种倾向。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指出西方资本主义的海外扩张导致了非西方世界向资本主义方向的变革和发展。^①后来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和“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两篇文章中,他又在对作为资本主义的对外行为表征的殖民主义进行道德批判的同时,进一步地指出了其历史地、客观地产生的“双重使命”,即对僵化、停滞的东方传统社会结构的破坏作用和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前提条件的建设使命。^②显然马克思的观点是建立在工业资本主义生产力所固有的自我巩固和自发扩张的性质以及资本主义内在的进步性的基础之上的。^③卢森堡以更理论化的方式发挥了马克思的“双重使命”命题:剩余价值的实现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存在必然以非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前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和海外殖民地两类)为前提,因为后者向前者提供其所必需的生产要素和产品市场,而资本主义国际贸易的基本功能也正在于此;但资本主义积累和交换过程却内在地产生了这样一个效应:这个过程由于把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纳入世界市场体系而自发地产生了促使其解体的作用,也就是说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同时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同化”前资本主义地区的过程,进而也是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④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比尔·沃伦则以战后第三世界发展的历史经验为依据,对外部资本主义在落后国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62—75页。

③ 参见什洛莫·阿维内里:《马克思与现代化》,罗荣渠主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第3—25页;奇尔科特:《比较政治理论:新范式的探索》,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315—316页。

④ 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论》,三联书店,1959年,尤见第三编,“积累的历史诸条件”。

家的扩张和渗透对后者的经济发展所产生的推动作用给予全面的甚至是毫无保留的肯定和颂扬。通过在标示战后第三世界发展的某些经验事实和资本主义的扩张之间建立直线式的对应关系,沃伦从根本上把战后第三世界发展的动力和原因完全归功于国际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他明确提出:“‘帝国主义’国家的政策以及这些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总体经济关系所产生的综合的、最终的效应实际上有利于后者的工业化和总体经济发展”,“作为与中心经济的联系的结果,边缘经济发展出自促增长的能力”;而“第三世界在战后阶段经历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和生产力的重大跃进”。他还针对依附理论提出,第三世界经济发展的阻滞因素不在于其与外部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之中,而是在于第三世界自身的“内部矛盾”,而且“在经济上相互依存加强的背景下,连接第三世界和帝国主义世界的‘依附’(或从属)的纽带已经而且正在随着当地资本主义的兴起而显著地松弛下来。政治经济权力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分配因而也趋于相对平衡。”据此他认为,在一定阶段自主的发展并不一定完全比依附状态下的发展更快、更优越,因为依附意味着更加彻底、全面地参与国际经济联系。^①实际上,抛开理论资源、术语和意识形态立场的差异不论,在国际经济关系(外部资本主义)对欠发达国家的作用的问题上,右翼自由主义思想史序列中的现代化理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采取的也是肯定的、正面估价的基本立场。而且这两派的观点也都被批评者判定为“经济简化论”(economic reductionism)。^②

在以上左、右两支理论路径中,都缺乏对外部资本主义对欠发达世界发展的影响的复杂性和差异性的充分估计,具有明显的绝对化和

^① Bill Warren, *Imperialism: Pioneer of Capitalism*, p. 9-10, p. 166-168.

^② 参见 David Booth, "Marxism and Development Sociology: Interpreting the Impasse", *World Development*, Vol. 13, No. 7, 1985; 庞建国:《国家发展理论》,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93年,第196—199页。

简单化的缺陷。实际上,各种主张正面估价外部资本主义对欠发达世界的作用的理论和观点在根本上都无从超越马克思“双重历史使命”的命题。马克思并没有全面系统地分析非西方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及其各种可能性,而现今对于我们具体地、历史地考察第三世界发展中外部因素的作用而言,仅仅认识到外部资本主义的破坏性和建设性作用是远远不够的。对沃伦的这一评断也可适用于所有单纯从正面理解外部联系对发展的作用的主张:“尽管他说的是真实的,但在一定意义上说,他却并没有说出全部的真理。”^①因为欠发达世界被纳入资本主义体系以来的全部经济和社会发展史说明,破坏作用是存在的,但却是不彻底的:外部资本主义导致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的瓦解,破坏了许多前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社会因素,但不能消除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全部阻滞因素,许多这样的因素在新的条件继续维持下来,甚至被外部资本主义势力有意识地加以巩固;建设作用也是存在的,但也远不是充分的:外部资本主义的扩张和渗透向欠发达地区引入了许多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物质、制度和精神因素,但却不能“同化”非资本主义社会,不能为欠发达世界的经济发展创造全部历史条件,不能在欠发达世界复制出完整的西方式发达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社会形态。这也可以被认为是战后保罗·巴兰等人的理论^②、拉美经委会思

^① 同 Booth 上引文, p. 766.

^② 巴兰的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出现于50年代。巴兰认为,帝国主义的任务不是扩展和加深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而是延缓和控制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西方垄断资本与落后国家的统治阶级结合起来,扼杀了落后国家民族资本的发展,使富于活力和竞争力的私人经济部门无从建立起来,从而使落后国家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丧失了当地的主导力量。他的理论成为后来的依附理论的重要来源。Paul Bara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57.

想^①、依附理论^②对资本主义国际经济秩序对欠发达国家的阻滞作用的揭示从相反的方向带给我们的启示。而世界体系理论由于其致力于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扩张的历史过程进行细致的阐述,对世界体系的结构也提出了更细致的分析,从而可以提供对欠发达世界的外部结构环境和历史境遇的更宏观的把握和更深刻的理解。它在这方面的贡献超越了只致力于揭示欠发达的成因和状态的各理论流派。

三

世界体系理论对后起发展研究最重要的价值之一就是,它所赋予的高度整体性的和“世界历史”的视野,能够比以上各种理论流派以更大的冲击力推动我们走出一个片面性的误区,即完全在民族国家/地区的范围内寻找欠发展的根源,同时把后起发展看成是单纯地植入先进的(西方的)技术、制度和价值观念的过程。关于战后包括台湾在内的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发展,世界体系的视角特别有助于提醒我们采取这样一种长期的、宏观的观点,即从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期趋向观察东亚发展,特别是引导我们充分考量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国家和地区是在战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持续扩张和深化的外部结构条件下,取得其发展成就并实现在世界分工格局当中结构位置的升进的。在这种视角下我们必须深究东亚发展的外部结构的特殊性质,即与其他地区相比,东亚 NICs 的外部联系中有哪些因素导致或者有助于其地位的升进。

^① Paul Prebisch,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atin America and Its Principal Problems*, New York: UNECLA, 1949.

^② 多斯·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A. G. Frank, *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Historical Studies of Chile and Brazil*, Revised and Enlarged Edition,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9.

同时世界体系理论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依附理论的僵化观点和不切实际的“脱钩”主张。与依附理论不同,世界体系理论认为核心/边缘关系的再生产和不平衡发展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内在特征,即特定国家/地区在核心、边缘和半边缘的结构位置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存在上升和下降两种基本运动趋势,这就为边缘国家/地区结构位置的升进即发展开辟了理论空间。^①这更加突出地表现在沃勒斯坦和切斯-顿等人所努力加以构筑的半边缘发展理论上。

沃勒斯坦当然首先要从结构观点,并且在经济的范围和层面界定半边缘。沃勒斯坦就半边缘的特性提出如下判定:1. 在一个地区内混合了核心和边缘型的生产形态,即既有高利润、高技术、高工资的生产活动,又有低利润、低技术和低工资的生产;2. 在空间上位于核心和边缘地区之间;3. 核心和边缘之间的中介(mediating)性活动在这里展开,即同时在世界体系中承担作为边缘的核心和核心的边缘功能;4. 其政治和制度特征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中介性的;5. 在利用世界体系总体变化所提供的机会方面具有比边缘和核心更强的适应能力,即半边缘是一个更具灵活性和流动性的结构位置。^②无疑半边缘的这些结构特点会使我们在头脑中立即把这个概念与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联系起来。在切斯-顿对半边缘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半边缘对东亚发展研究的适切性:“半边缘地区倾向于创造出改变生产关系,并导致新的集团掌握统治权(或至少是统治结构重组)的新制度形式,半边缘被看做是社会、组织和技术创新的肥沃土壤,是上移运动的战略位置,是资源控制的新的中心的建立。所以,

^① Wallerstein, “Dependence in an Interdependent World: the Limited Possibilities of Transformation within 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 *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 Cambridge Univ. Press, 1979, pp. 65-67.

^② 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第464—465页;Wallerstein, “Semiperipheral Countries and the Contemporary World Crisis”, *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 pp. 96-97.

说,世界体系理论在提供宏观的和结构的视角、在帮助在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之间寻求更具有综合性的观点的同时,在将研究引导向新的更深刻的问题和问题领域的同时,却无法提供有效的、精确的概念和分析工具,甚至有与经验事实不相切合乃至明显冲突的情形。这是笔者在对战后台湾发展进程(40年代末至60年代末)中的美国因素的经验研究^①中所深切体会到的。

同时,尽管对政治的向度给予了更多的考量,但世界体系论者还是坚决而明确地判定了世界体系的经济本质,换句话说,世界体系与世界经济体和世界市场对等,但“国家间体系”却是次一级的制度结构,它要服从于整体结构的逻辑亦即世界规模资本积累的逻辑。它对战后国际体系的观察,也基本上建立在资本主义积累或世界经济体对国际政治结构和过程所自发地产生的派生和规定作用的理论和逻辑基础之上。吉登斯批评说,沃勒斯坦显然“低估了特定的政治和军事因素对现代世界的社会变迁过程所产生的冲击。”^②

沃勒斯坦和切斯敦等世界体系论者都认为,传统的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领域里的研究都过于关注“权力政治”、“国家利益”等“国际政治”因素,而忽视了经济因素和市场力量,把“国家间体系”的运作看成是脱离于他所定义的“世界经济体”的。切斯敦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展现了一个单一的逻辑。在这个单一的逻辑中,无论是政治军事权力,还是通过世界市场上生产和交换而独占剩余价值,都起着同一个(维持世界体系的运作的)作用。”而世界体系运作又单纯地是指积累/再生产过程的持续、稳定的进行。^③

沃勒斯坦和切斯敦对只关注“权力政治”的西方传统国际政治学

^① 董正华、赵自勇、庄礼伟、牛可:《透视东亚奇迹》,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四部分“东亚发展中的美国因素——台湾个案研究”,第441—598页。

^② 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第207页。

^③ C. Chase-Dunn, “Interstate System and Capitalist World-Economy: One Logic or Two?”,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25, No. 1, 1981, pp. 20—23.

的批评是有道理的,而且他们的理论为发展研究乃至国际政治和外交政策研究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新视角和新问题。但是他们走得太远了。雷伊在对他们的批评中提出了虽显得有些含糊但也不失公正平和的观点:“尽管国际政治进程经常地反映着国际经济进程的影响,但同样真实的是,后者有时也强烈地影响着前者。我觉得,至少对本世纪内的世界大战而言,与其说那是经济进程对政治军事冲突产生了更大的影响的例子,不如说那是政治军事冲突对经济进程产生了更大的影响的例子。虽然对这一争论的一个明显的解决办法是采用互补的或者辩证的关系的方向,但现在所需要的是对传统的关于全球政治体系的学术研究和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的分析进行综合。这种综合将说明,在哪些情况下,在什么环境中,政治的或者经济的因素是更加本质性的,并需要在对用以说明对外政策和国际政治的结果一系列原因中给予优先的理论考虑。也许世界政治体系的运作和现代世界体系的运作有时是相对独立的,但毫无疑问的是,在更多的情况下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才是关键的。”^①左尔伯格也指出:“与沃勒斯坦的理论意愿恰恰相反的是……‘(世界)体系间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基本关联’在任何时候都不仅仅是经济的。从一开始,另一个可以加以确定的结构就同他展示给我们的结构性联系处于互动状态之中——这是一个他不愿或者不会看到的结构。……我头脑中的结构性联系中容纳了一组政治—战略性质的行为主体。”^②吉登斯提出的也是一个类似的判断:“‘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只指世界体系的一个特殊面向,而不是指世界体系的整体。国家(间)体系与此同等重

^① James Lee Ray, “The ‘World-System’ and the Global Political System: A Crucial Relationship?”, Pat McGowan and Charles W. Legley, Jr. (eds.), *Foreign Policy and Modern World-System*, Beverly Hills: Sage, 1983, p. 30.

^② A. R. Zolberg, “Origins of the Modern World-System: A Missing Link”, *World Politics*, Vol. 33, No. 2, 1981, pp. 253—281.

要。”^①从以上我们可以采借到一个有助于更加全面、也更加具体地理解和认识东亚发展的外部因素的启示：在对战后国际体系的观察中应该对经济和地缘政治—军事两方面的结构和过程都给予重视，并对他们之间的关系进行充分的分析。战后台湾与美国的边缘—核心关系为及其对台湾产生的影响不能单纯在跨国经济关系的维度上加以认识，而必须首先置于冷战的地缘政治过程中加以观察。在这样一组依附关系中，核心的行为是无法用核心跨国资本的行为逻辑来说明的。

五

除了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以及海外私人投资和国际贸易的空前繁荣之外，战后国际体系的运行中纳入了一个全新、真正具有长期的历史具体性的因素：两大国际阵营之间的冷战。在这一场在规模、广度和深度上都史无前例的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中，发达国家尤其是作为核心/霸权国家的美国的对外政策行为中被注入了新的、具有广泛、持久和深刻的影响效力的地缘政治动因。

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战后美国霸权的行为逻辑在根本上服从于资本主义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借用沃勒斯坦的话也可以说，美国霸权的生成和运作反映了战后“世界经济体”的持续扩张。并且与一般的资本主义国家所不同的是，“虽然它和这些国家一样关注本国范围内的利润最大化和利润积累，但它同时又要为全球规模的资本积累执行政策和战略。”“美国帝国主义国家 (state) 的政策最终总是既反映着在特定阶段内霸权国家的资本自身

^① 吉登斯前引书，第209—210页。

的局部利益，又反映着保持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利益。”^②美国的统治集团对其所承载的维持和复兴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历史使命或者说“功能”有着相当程度的自觉的认识：它对战后的资本主义国际经济秩序有着明确的总体设计，即一个多边的、开放的、符合经济自由主义原则的一体化国际经济体系。这一点首先突出地反映在美国为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其他国际经济制度结构而作出的努力上。美国对西欧经济复兴的支持中也体现了这样一种深层次的经济方面的考虑，即西欧经济的复兴是美国经济的繁荣必需的条件。正如一位学者指出的：“帮助改变欧洲面貌的马歇尔计划的真正意义不在于美国人是利他主义的还是自私自利的——实际上他们既是利他主义的又是自私自利的——而在于(美国统治集团)认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的生存要求进行系统的资源流动。”^③实际上，美国所领导的冷战本身就是为维持和扩张全球性资本主义经济而对最大规模的“反体系运动”(counter-system movement)——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进行的斗争。经济方面的动因在作为整体的战后美国对外政策行为中起着持久的深层次的作用，而且在许多情况下经济方面的动因与地缘政治性质的冷战战略是并存、重叠甚至统一的。这一点也体现在美国对包括东亚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的战略和援助政策当中。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布鲁斯·卡明斯发现，在日本和东南亚之间建立稳定的工业品产地和生产原材料的“经济腹地”的层级经济分工关系，以及在美国、日本和东南亚之间建立类似于核心、半边缘和边缘关系的“三边”贸易关系，是1948年到1950年美国东亚政策相当

^① Chronis Polychronous and Harry R. Targ,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apital and U. S. Imperial State Policy: A Marxist Analysis of U. S. Struggles for Global Hegemony", in Chronis Polychronous (ed.), *Perspectives and Issu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Westport: Praeger, 1992, p. 63.

^② Richard Barnet, *The Alliance: America, Europe and Japan, Makers of the Postwar World*,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3, p. 120.

明确的方向之一。^①

然而,我们既不能以单纯的经济视角去理解和解释美国核心/霸权的行为,也不能在对美国霸权行为的分析中在地缘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之间建立简单化的、单线式对应的关系图式,即完全把前者看成是取决于后者或从属于后者的派生性变量。这是因为,第一,美国霸权的运作也不断展现出政治过程影响和作用于经济过程、经济过程依赖于政治过程的逻辑序列关系。罗伯特·吉尔平指出:“跨国公司……不可能脱离美国外交政策的大目标;美国与西欧之间在防务上的联系,为美国跨国公司的海外扩张大开方便之门;美国统治下的和平为这些经济活动以及其他跨国活动提供了一种政治框架。”所以,“美国的跨国性海外扩展只有联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起来的政治体系的来龙去脉才能得到理解。”^②第二,虽然也可以认为核心/霸权国家要承担世界体系论者所说的世界规模的资本积累的功能,但正如斯考克波尔和其他学者的研究所表明的,它并不是完全被动地、单纯地执行这种功能的和不为其他因素所加以中介(unmediated)的工具,并不惟一地反映本国经济统治阶级的利益、愿望和要求,甚至可以说霸权国家(state)行为的逻辑有时在很大程度上是独立于资本积累和扩张的经济逻辑的。^③美国政府并不是美国垄断资本手中

^①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 48/1 号文件的最初草案中曾明确提出建立这种“三边贸易”的设计,并指出这种贸易关系会“对各种商品的生产成本提供一定的优势”。Bruce Cumings,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Northeast Asian Political Economy: Industrial Sector, Product Cycle and Political Consequences”, in Frederic Deyo (e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ew Asian Industrial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p. 59 - 65.

^② 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2—3页。

^③ Theda Skocpol, “Wallerstein’s World Capitalist System: A Theoretical and Historical Critiqu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82, No. 5, 1977, pp. 1075 - 1090; James p. Hawley “Interest, State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and the World-System: The Case of the U. S. Capital Control Programs, 1961 - 1974”, *Foreign Policy and Modern World-System*, pp. 224 - 229.

任意揉搓的面团。世界体系理论的一大缺失是没有自己的国家理论,它不去考察核心和边缘国家政策制定的政治和行政过程,不去考察国家之下的集团和群体行为的具体动机。这正是它的简单化经济决定论的必然结果和集中表现,也是它对东亚发展的解释力不足的重要原因。沃勒斯坦对半边缘在世界体系内承担的功能的论述指向了政治层面,但这些论述太过概念化、一般化,显然对更细致地分析东亚的这种依附类型没有直接的用处。在沃勒斯坦那里,发出“发展邀请”的是核心资本家,而我们在台湾却看到,提携其发展的“恩主”(patron)是美国联邦政府,更具体地说是国务院和国际开发署。

其实美国对外政策史方面的研究足以说明,在台湾到70年代初升进为“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之前的这一段时间内,美国对台湾的政策从总体上看是比较纯粹的地缘政治导向的,即美国在台湾的国家行为的基本出发点是维持台湾作为对抗共产主义的战略据点的生存和发展。战后美台关系首先是一种美国霸权根据其在冷战中的地缘政治目标加以构筑的关系,是一种建立在政治和军事性质的霸权—附庸关系之上的新型依附关系。与依附理论描述过的通常在拉美所见的依附关系不同,在台湾经济依附不是政治和军事依附的原因,而是政治和军事依附成为经济依附的先导。这种关系两端的行为主体是主要反映政治与权力逻辑的霸权国家和附庸政权,核心/霸权一方的跨国资本在这种关系中并非一个积极的和起主导作用的活动者,其政府机构享有相对于本国经济阶级和集团的充分的“自主性”。概言之,战后美台关系是一种以地缘政治利益为动力和基本取向,以“国家”(政权)间(inter-state)关系为主轴,以援助为的主要内容的特殊形式的依附关系。这是台湾战后启动经济发展和国际整合进程的特殊基本条件。^①

实际上这一点不仅表现在美国对台湾的政治军事政策和援助政

^① 董正华等:《透视东亚奇迹》,第482—484页。

策上,也表现在美国对台湾的经济贸易政策上。^①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对东亚(至少是台湾和韩国)发展研究而言,仅仅承认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一方的政权的自主性是不足的。无论在核心还是边缘,都存在着资本家与国家政权在利益和目标方面相互分离的问题。霸权国家也有自己的,出高于作为资本积累的工具之外的行为逻辑。从大萧条时期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到战后初期,随着美国总体对外政策模式由孤立主义向全球主义的转换,美国经历了联邦政府“安全体制”的建立和国家政权机构持续扩张及其力量和职能不断强化的过程。^②此中美国国家政权在更大程度上豁免于其内部社会和经济利益集团的牵制和影响,在许多情况下取得了“相对自主性”,主要从“国家安全”而不是经济利益的角度出发去制定和执行对外政策。一般说来,在美国的“安全利益”并不明显时,美国国内在特定国家拥有投资和贸易利益的经济利益集团仍然会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力。但60年代中期以前的台湾显然不属于这种情况。^③1950年,美国对台湾的出口仅为2290万美元,自台湾的进口更是仅为区区330万美元。1952年后美台贸易虽有大幅度增长,但其数额在达上千亿美元的美国对外贸易总量中所占的份额也是微乎其微的(参见下页表1)。

而美国在台湾的投资利益也长期处于极低的水平上。在1952年以前,美国对台湾的私人直接投资几乎为零。1952年也仅有一例美国私人投资,数额仅为180多万美元。50年代中期以后虽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但整个60年代大部分年份美国私人投资数额也都在

① 参见 Robert E. Baldwin, Tain - Jy Chen, and Douglas Nelson, *Political Economy of U. S. Taiwan Trade*,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5, p.55, pp.56-60.

② 参见布鲁斯特·C·丹尼著:范守义等译,《从整体考察美国对外政策》,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第43—88页。

③ 参见理·E·巴雷特:“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国家政权的自主性与内部意见分歧”,韦艾德、葛苏珊主编,《台湾政治经济学诸论辨析》,台北,人间出版社,第165—187页。

表1 美国与台湾的贸易,1947—1970 单位:百万美元

年份	美国对台湾的出口	美国自台湾的进口	年份	美国对台湾的出口	美国自台湾的进口
1947	9.2	0.3	1959	83.5	13.5
1948	6.0	1.1	1960	113.1	18.9
1949	53.4	1.7	1961	130.8	42.8
1950	22.9	3.3	1962	115.4	53.2
1951	41.1	6.0	1963	150.5	53.9
1952	85.6	4.1	1964	139.0	80.6
1953	74.1	5.3	1965	176.4	95.7
1954	98.1	5.0	1966	166.3	115.6
1955	95.5	5.4	1967	247.3	167.8
1956	81.4	6.7	1968	239.5	278.2
1957	84.7	5.2	1969	291.8	399.0
1958	84.4	9.7	1970	363.8	564.2

资料来源: *Political Economy of U. S. - Taiwan Trade*, p.4.

3000万美元以下(参见下页表2)。实际上,不仅美国的私人投资没有大举进入台湾,而且日本资本在60年代以前也没有作为一支重要的力量重新出现。占海外私人投资份额最重的是海外华人资本。

这样,在美国对台贸易和投资均处于低水平的情况下,在美国与台湾之间形成的这样一组“核心—边缘”的关系结构中,美国的跨国私人资本并不享有重要的甚至是主导地位。韩国的情况比台湾有过之而无不及:1963年朴正熙政权开始启动出口扩张时,“在当地完全看不见跨国公司的影子”;而1967年,韩国的全部外国直接投资仅有7800万美元,约相当于巴西外国直接投资的2%;跨国公司控制当地资本的规模和控制当地劳动力规模的指数,在1967年的韩国仅占103个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指数的12%,而巴西在同样的指数中占

平均数的 140%。^①

表 2 美国对台湾的私人投资, 1952—1970 单位: 万美元

年份	项目数	总额	年份	项目数	总额
1952	—	—	1962	8	74
1953	1	188	1963	9	873
1954	3	203	1964	7	1020
1955	2	442	1965	17	3110
1956	2	101	1966	15	1771
1957	1	1	1967	18	1571
1958	—	—	1968	20	3456
1959	1	10	1969	30	2786
1960	5	1403	1970	16	6782
1961	1	429			

资料来源: *Taiwan Statistical Book*, p.264.

六

让我们再来接受来自彼德·埃文斯的启发。他在对拉美的研究中提出了“三边联盟”模式,从核心国家的跨国公司、边缘国家的民族资本和国家政权之间的互动关系出发去考察边缘国家的经济与世界经济体系结合的方式,并且将这三者确定为共同构成依附发展的体制和结构的关键行为主体。^②对拉美发展而言,三边联盟模式显然具有深厚的经验基础和强大的解释效力,而且对其他地区的发展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参照价值。但东亚的基本状况与拉美有着显著的差别。当把目光转向东亚后,埃文斯本人也发现了东亚与拉美的差别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即美国对拉

^① 埃文斯,“东亚的阶级、政府和依赖性:拉美主义者可吸取的教训”,戴约主编,《经济起飞的新视角——亚洲新兴工业化实体的政治经济分析》,第 236 页。

^② Peter Evans, *Dependent Development: The Alliance of Multinationals, State and Local Capital in Brazil*,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美经济的渗透程度和美国跨国私人资本的地位在拉美的地位比东亚高得多。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和英国的私人直接投资就在拉美的农业和采矿业中取得了支配的地位,而且与这两个部门中的传统精英阶级建立了紧密而稳定的联系。战后,美国私人投资在农业和采矿业中的地位并没有下降。在一些安第斯和加勒比国家,农业和采矿业仍然是美国私人投资的主要领域。但是在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新兴工业化国家,美国私人投资很快将其重点转向制造业领域。在这些国家,当先导的工业部门一出现,美国的公司很快就被授予特权。这使得美国的跨国公司在这些国家的战后工业化进程中从一开始就占据了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地位。这样,拉美工业化进程实际上发生在美国跨国资本利益广泛存在的条件下。^①同时,在拉美远离冷战前沿和美国基本上能够稳定地维持拉美作为其战略“后院”的地位的情况下,地缘政治因素和美国的国家政权在构筑和保持双方的依附关系中的作用相对于经济因素和美国的跨国私人资本是淡化了的和相对次要的。一位经济学家也指出了东亚和拉美之间与上述情况相关的这样一种差别:拉美的外资构成以来自私人部门的资金(包括外国直接投资和来自外国私人银行的贷款)为主,而在东亚则国家偏重于来自公共部门的外国资金(包括援助和来自国际金融机构的贷款)。她的统计还显示,从 1961 到 1965 年间,外国直接投资占引进外资总量的比值约为:巴西 39%,墨西哥 42%,台湾 18%,韩国仅为 2%。^②

然而,埃文斯却没有在理论上进一步容纳东亚经验所显示出的

^① 埃文斯前引文,第 234—238 页。

^② Barbara Stallings, “The Role of Foreign Capital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Gry Cereffi and Donald L. Wyman (eds.), *Manufacturing Miracles: Paths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Latin America and East Asi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59-63.关于东亚外资的作用,另参见哈加德、程同杰(Tun-jen Cheng, 应为郑敦仁),“东亚新兴工业国(地区)的政府与外国资本”,戴约前引书,第 92—150 页;Chi Schive, *The Foreign Factor: The Multinational's Contribution to the Economic Moderniz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90.

核心(霸权)国家的国家政权在决定依附关系中的主导地位,而这与他所看到的在东亚跨国资本力量相对薄弱的情况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他显然不愿放弃在东亚套用三边联盟模式的努力:“东亚同拉丁美洲一样,在依附性的资本主义发展后面确实存在着三方之间的结合,在三方联盟中跨国私人资本和当地私人资本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但(与在拉美跨国资本在三方联盟中占据了支配地位所不同的是)东亚的政府当局担当了居主导地位的合伙人。”^①他指出了在东亚跨国资本和当地政权与拉美的情况的不同,但仍然没有赋予核心国家政权以应有的理论地位。然而研究显示,美国的国家政权在台湾与外部体系的整合及其内部发展的过程与方式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应受到理论上的漠视。我们可以在此提出,在东亚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必须对“三边联盟”的解释框架作出扩展,必须通盘考虑核心(霸权)的国家政权和跨国资本、边缘的政权力量和民族资本这四个依附的过程与结构中的基本要素和行为主体。也就是说,这里要提出的是一个“四角关系”的模式。

笔者对台湾个案的研究显示,在70年代初以前,由这四个结构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的“东亚型”(台湾和韩国)依附关系至少在以下方面展示了与拉美式的或者被依附论者认为是典型的依附关系的差异,而这种差异也可以标示台湾(至少还有韩国)依附发展的基本的结构和历史特征:

第一,总体上这种依附关系是以地缘政治因素而不是经济因素为基本内容和动力的,是建立在地缘政治(国际政治)意义上的霸权—附庸关系的基础之上的政治经济依附关系;

第二,核心的国家政权与边缘的政权力量两者之间的关系才是依附关系网络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和居于中心地位的关系环节;在此特别值得进一步指出,台湾的经济技术官僚和美国国际援助机构

^① 埃文斯前引文,第253页。

结成的“跨政府联盟”^①在台湾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和政策制定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②;

第三,与上一点相关的是,核心的国家政权在加强边缘政权对自己的政治依附的同时还具有在一定程度上加强后者对内部社会的自主性和控制力的效应,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加强它相对于跨国资本的力量和地位;^③

第四,依附关系和过程中存在着经济资源的流动,但其主要内容不是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的、作为单纯的经济过程的私人部门之间的贸易和投资,而是以换取地缘政治利益为目的、本质上是一种政治行为的“公共资本”流动即援助;

第五,核心跨国资本在边缘的活动在总体上呈现出“贸易(经济关系)追随旗帜(政治关系)”(Trade follows Flag)的趋势,它与边缘经济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要通过核心政权与边缘政权的关系,后一组关系对前一组关系一方面具有引导和促进作用(“援助引导投资”),另一方面这种作用是相当有限的,有时甚至有某种程度的制约效应;

第六,核心与边缘的联系的整体效应不是削弱而是加强当地私人资本。

显然,这种类型的中心—边缘关系已在一定程度上出离了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把依附关系作为一个本质上的经济范畴所作的定

^① 罗伯特·基奥恩和约瑟夫·奈的“跨政府联盟”一词指:一国政府中的次级单位与其他国家政府中有共同理念和利益的机构及其成员建立对抗它们自己的政府中的某些机构和高级领导人的关系。“跨政府关系和国际组织”,西里尔·布莱克主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第601—610页。

^② 董正华等前引书,第四部分,第二章第一节,第五章。

^③ 董正华等前引书,第四部分,第二章,第五章。埃文斯也发现了这样一种情况。Peter Evans, “Transnational Linkages and the Economic Role of the State: An Analysis of Developing and Industrialized Nations in the Post-World War II Period”, in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Cambridge Univ. Press, p.217.

义。如果把跨国资本的作用和地位作为依附关系的核心,则台湾以及韩国就不能被认为是依附。而且虽然台湾 60 年代以后的经济增长对国际贸易(尤其是对美国和日本的贸易)有着高度的依赖,但也没有造成依附论所勾画的典型欠发达状态下的内部经济结构和利益分配格局。但是,“依附”作为描述紧密的以宰制/从属为基本特征的跨国政治经济关系的一个词汇仍然是难以被放弃的。的确,除了“依附”,战后美国与台湾和韩国政治经济关系的不对称不平等实质还能用别的什么词加以准确的表述吗?

以上论述的一个重要意义正在于深化对依附的内容的复杂性和依附的形式多样性的认识。在原有的概念不能充分容纳经验时事的情况下,一个合理的选择是在加深对依附的具体内容和形式的理解的基础上拓展原有的概念和定义。就此本文可以提出的是,国际政治体系中的霸主—附庸(patron-client)关系同时也是一种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依附关系,世界体系视野应当容纳这种类型的关系。依附论者依照历史发展序列归纳出依附的三种结构类型,即“殖民地商业—出口依附”、“金融—工业依附”和“技术—工业依附”,^①但台湾提供给我们的是一个“地缘政治依附”(从性质上讲)或“援助依附”^②(从内容上讲)的案例。

战后台湾发展的外部动力机制正在于这种形式的依附关系。在为这种形式的依附关系所决定的它与世界体系的整合进程中,外部联系为它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和条件——资金、技术、外部市场、先进管理方法和制度要素的引进,以及政权的生存安全、政治稳定和政权的“自主性”。但外部联系在通常情况下会对欠发达国家的

^① 多斯·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第 316—317 页。

^② 参见文馨莹:《经济奇迹的背后——对台美援的政治经济分析》,台北,自立晚报出版社,1990 年。

发展造成的结构性障碍和消极后果却被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内。^①这种难得的境况取决于相互联系的三个方面:第一,在战后发展进程展开最初,外部经济势力尤其是跨国资本在发展的外部结构系统中是缺席的,而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其对当地经济渗透和影响的加深也是缓慢的和有限的;第二,台湾的经济发展与霸权国家的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利益趋于高度一致,霸权国家政权对当地的发展抱有真正的积极愿望,而它处于巅峰状态的和充足的政治经济实力以及台湾相对狭小的人口和经济规模又能保证其为促进当地发展付出的努力取得切实的效果;第三,在跨国私人资本的经济渗透和政治干预有限,而霸权国家政权在这方面给予默许甚至某种意义上的支持的情况下,台湾的政权力量能够长期执行对外资的限制、规范和对岛内企业的保护政策,从而对当地经济与外部体系的整合的进度、内容和方式进行了有效的选择和控制。

战后台湾的发展完全可以被认为是联系性发展(associative development)的成功案例,但是更准确地说它只是一个特例,不应该被看做是能够为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所效法的范例。在一部在发展研究中没有得到充分重视的著作中,德国学者森哈斯从欧洲发展的历史经验出发阐述了这样一个道理:联系性发展并非没有成功的可能,但这必须具备一系列的条件和动力。森哈斯认为这样的条件首先在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内部:内部的社会结构和制度环境将决定能否在发展进程中建立和释放其内部市场潜力,决定工业和农业两大部类的生产力能否同步地、持续地提高,并最终决定先进生产力能否在整个经济中扩散。^②但是战后台湾发展的经验说明,一个欠发达经济体

^① 参见乌尔里希·门泽尔,“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帝国主义的延续还是迎头赶上的实例?”,罗荣渠主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第 459—479 页。

^② Dieter Senghaas (translated from German by K. H. Kiming), *The European Experience: A Historical Critique of Development Theory*, Leamington: Berg Publishers, 1985, 尤见 pp. 64—65.

发展的条件和动力也同样深刻地植根于其与外部体系的联系之中。而正是在一种在当时极为特殊、其后也不可能重复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在外部规定性和内部的主动性的共同作用下,台湾(以及韩国)之与世界体系的结合方式与其内部发展的要求之间达成了某种程度的相互适应和协调的关系,实现了依附与发展的统一,实现了在世界体系结构位置中的升进,成为罕见的“应邀发展”的成功案例。

(牛可 1969年生 北京大學歷史系講師)

试评《南唐国史》

李全德

五代十国由于历时较短,又处于中国古代唐、宋两大盛世之间,故对其研究并没能引起近代学者的足够重视。进入80年代后,大陆出版了关于五代史的第一部专著《五代史略》;90年代又出版了十国史研究的第一部专著,即任爽的《南唐史》,五代十国史研究开始出现突破。但总的来说,对五代十国史的研究仍属薄弱。2000年6月邹劲风博士《南唐国史》出版,当视作近年来关于南唐史研究的最新成果。该书的序言称作者“基本上网罗了目前可以见到的南唐史料,并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予以贯穿”,誉之为“当代青年史学工作者的佳作之一。”本文不拟对该书进行全面评述,只想围绕可能影响其学术价值的几点问题略作讨论,以就教于方家。

该书第一章是史料及研究状况。此章内容曾分别发表于《中国史研究动态》1996年第五期及《江海学刊》1998年第二期,两文中原已存在的问题至该书出版时依然存在。问题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对相关古籍资料的搜集不够;一是对所研究领域的相关成果了解不足。

现存有关十国的古籍史料中,关于南唐的相对较为丰富,但除了马令、陆游分撰的两部《南唐书》及吴任臣《十国春秋》之外,便再无完整而又系统的史料,更多材料分散见于各种正史、野史、杂记、地方志以及宋人笔记、文集之中。而作者尽管辟出专节介绍有关南唐的史